

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

焦南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拜读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一书,我认为这是一部较为重要的田野考古报告,其成果显示了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善莫大焉”,可喜可贺。

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有了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一个世纪以来,从中、日、法、美多国专家的短期踏查、测量,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博物馆的部分勘察和试掘,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系统调查和重点发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果^[1-2]。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等单位勘察了茂陵,并先后对长陵的陪葬墓、汉文帝窦皇后南陵的从葬坑、阳陵的刑徒墓地等进行了试掘,了解了个别帝陵的部分布局及结构,开始对西汉帝陵的形制特点有所了解,并发表了若干篇调查、试掘简报^[3],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西汉帝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测。社科院考古所对汉宣帝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考古钻探和科学发掘;陕西考古院对汉景帝阳陵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勘察、钻探和发掘;对汉武帝茂陵、汉惠帝安陵、汉昭帝平陵等进行了部分钻探和试掘。在此期间,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陆续刊布了《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西汉十一陵》、《汉杜陵陵园遗址》等系列研究成果^[4];陕西的考古工作者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的考古简报和论文^[5]。通过近30年的考古工作,基本确定了西

汉十一陵的名位及排列顺序,了解了西汉帝陵形制结构的基本要素,掌握了西汉帝陵布局“阳陵模式”的基本特点及规律^[6],把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高点。

2001年7月~2005年10月的五年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汉帝陵(除汉阳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钻探,《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就是其研究成果总结。与首部有关西汉帝陵整体的阶段性田野考古成果《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相比,《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不仅有地面调查、平面测绘的成果,还首次公布了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及钩弋夫人云陵的考古钻探资料。这些新的钻探资料丰富了我们对西汉帝陵的认识,例如:汉高祖长陵发现了陵园“垣墙四面均开有门,东、西、北面皆发现一门,南面发现两门。”^[7]帝、后2座陵墓“发现其东、南、北均有一条墓道,西面均未发现。”陵园内“共发现陪葬坑33个。”汉武帝茂陵帝陵“陵园内陪葬坑共钻探出63条,围绕茂陵封土呈放射状分布。”“陵园外陪葬坑共发现115条”。“在东距茂陵1.1公里的陪葬墓的东侧、茂陵东司马道的北部,”发现“茂陵邑周长11190米,总面积5536500平方米”等等。收获丰硕,不胜枚举。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调查、钻探咸阳辖区内西汉9座帝陵的同时,较为全面地搜集了汉文帝霸陵、汉景帝阳陵、汉宣帝杜陵、太上皇万年陵等陵墓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广泛汲取了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因此《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内容丰富,价值颇大,是西汉帝陵研究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杂处在西汉帝陵之间的“周王陵”及其附近的所谓“周公陵”、“鲁公陵”,一直是确认西汉帝

陵名位、研究西汉帝陵布局的难点之一,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这一难题,进行了认真调查和钻探,发现了南北向长方形布局的陵园2座、亚字形大墓4座等。《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初步认定其为战国秦的“公陵”和“永陵”^[8],为西周王陵探索疑点的排除、秦人陵墓系列链条缺环的弥补以及西汉帝陵的研究补充了基础资料。

《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作为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在众多新发现、新成果公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若干不足之处。例如:包括汉景帝阳陵在内的西汉中晚期8座帝陵的外陵园未能发现;多座帝陵的墓道未探出或未探全;有的帝陵的陪葬坑也未探全。存在上述不足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三点:一、西汉帝陵作为十多个自成一体又相互关联的陵墓类大遗址,具有占地面积大、遗址遗迹类型复杂多样、遗迹遗物埋藏深而丰厚的特点,故其调查、钻探的难度较大;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科研力量有限、经费严重不足、设备紧缺加之工作时间远远不足;三、传统学术认识的局限。

瑕不掩瑜,《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虽有瑕疵,但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的编写与出版对西汉帝陵的学术研究、大遗址保护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十一五”期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展开了咸阳地区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四年多来,我们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字化”的工作思路,田野工作与资料整理齐头并进,取得了较大成果。截至目前,已先后完成汉武帝茂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以及“周王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9]。

“十二五”期间,我们将继续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汉高祖长陵、汉昭帝平陵、汉成帝延陵的考古工作;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合作展开汉文帝霸陵、汉宣帝杜陵、汉成帝废陵—昌陵等考古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认真细致的田野工作和研究,使西汉帝陵的考古研究达到新的水平,为西汉帝陵的大遗址保护提供科学翔实的基础资料。

- [1]焦南峰. 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C]//西部考古(第一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
- [2]笔者见到的有:伊东忠太. 东洋建筑的研究[M]. 龙吟社,昭和十二年. 关野贞. 支那の建筑と艺术[M]. 岩波书店,昭和十三年. 沙畹. 《华北考古记》、《中国考古图录》等,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731页. 水野清一. 前汉代に於ける墓饰石雕の一群に就いて——霍去病墓の石刻[J]. 东方学报(第三册),1933. 法国人谢阁兰(一译色伽兰)V. G. Segalen, et al. ,Mission archeologique en chine, Paris: Geuthner, 1914 - -1917. 谢阁兰. 中国西部考古记[M]. 冯承钧译. 商务印书馆,1930. 美国人毕安祺. C. W. Bishop, "Notes on the Tombs of Ho Ch uping" ,No. 1, 1928年. 阎文儒. 西京胜迹考[M]. 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3(6). 徐炳昶,常惠. 陕西古迹调查报告[M]. 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4/6):1—17, 1933(11).
- [3]. 陕西省文管会. 陕西兴平县茂陵勘察[J]. 考古,1964(2). 陕西省文管会,咸阳博物馆. 陕西省咸阳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J]. 文物,1966(3). 王学理. 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J]. 考古,1976(2). 王志杰,朱捷元. 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发现的重要文物[J]. 文物,1976(7). 秦中行. 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J]. 考古,1976(12). 咸阳市博物馆. 近年来咸阳发现的一批秦汉文物[J]. 考古,1973(3).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杜陵陵园遗址[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刘庆柱,李毓芳. 西汉十一陵[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7). 刘庆柱,李毓芳. 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C]//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李毓芳. 西汉帝陵分布的考察——兼谈西汉帝陵的昭穆制度[J]. 考古与文物,1989(3). 刘庆柱,李毓芳. 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J]. 考古与文物,1985(5). 李毓芳. 西汉帝陵封土渊源与形制[J]. 文博,1987(3). 刘庆柱,李毓芳. 汉宣帝杜陵寝制度研究[C]//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等等
- [5]焦南峰. 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 注释[M]. 西部考古(第一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
- [6]王建新. “阳陵模式”与西汉帝陵制度[R]. 汉唐陵墓制度研究项目最终成果报告. 2005(7).
- [7]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0). 本文所引用资料未加注者,均同上,不赘。
- [8]刘卫鹏,岳起. 咸阳原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J]. 文物,2008(4). 刘卫鹏. 咸阳秦“公陵”和“永陵”的建制[C]//秦文化论丛(第15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 [9]焦南峰等. “十一五”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新收获[N]. 中国文物报,2010-4-2(5).

(责任编辑 谭青枝)